

从社会心理探析近代上海苏北人的污名化

闻羽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对近代上海苏北人的“污名化”是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的一种社会现象。苏北人之所以成为偏见和歧视的对象,是由多重因素共同建构的结果。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解读近代上海苏北人遭受“污名化”的过程,并就其中污名建构的原因和机制进行探讨。

关键词:社会心理;近代上海;苏北人;污名化

中图分类号:B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09)03-0064-04

自十九世纪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以后,外地人口开始大规模涌入上海,这其中又以来自苏北的人群占多数。随着清朝末年、民国时期战乱、洪灾、饥荒的不断发生,越来越多的苏北人移居上海以求生存,“到解放初,统计人口时,苏北人就占上海总人口的45%”^[1]。尽管苏北移民在人口规模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其职业等级和经济社会地位根本无法与人口数目成正比。在很长的时间里,苏北人群体一直备受上海本地人和江南移民的歧视和不公正对待,“苏北人”或者“江北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词汇,而成为贫穷、愚昧、粗俗和落后的象征,“‘江北人’等称谓亦是上海方言中的骂人话之一”^{[2]98}。在近代上海的历史社会发展进程中,苏北人(江北人)群体被赋予了太多的负面特质,遭到了严重的污名化。

在近代上海,为何会对苏北人这一特定移民群体或族群有如此广泛深入的社会偏见与歧视,这种社会现象的过程以及背后的成因和机制到底是什么,一些学者和专家对此做出了研究和解释。比较有名的当属耶鲁大学的历史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所著的《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该书多角度描述了上海苏北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歧视现象,同时分析了上海苏北人这一群体逐渐形成一个族群的原因和过程。该书是研究上海苏北人这一特殊群体的专著,得到了学术界很高的评价,因此,本文论述所基于的资料

和史实大多参考于该书。但是已有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大多从历史学或人类学的视角来剖析,本文则试图应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知识进行探究,因为近代上海苏北人的污名化问题属于比较典型的社会偏见和歧视现象,这种污名建构的过程、成因和机制理应属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畴。

关于污名化(stigmatization)的研究历史并不久远,通常认为“戈夫曼(E. Goffman)在1963年最早提出污名化的概念,并把它作为社会歧视的起点”^[3]。埃利亚斯认为,“污名化是指一个群体及其个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及其个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4]155}。林克(Link)和费兰(Phelan)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界定了污名的概念及其5个要素:贴标签、刻板印象、隔离、地位丧失和歧视。一般认为,“污名概念包含污名化、被污名者和实施污名者三个要素,而污名化被视为一种动态的建构过程,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处于强势的实施污名者通过贴标签将被污名者的某些负面特征加以扩大,直至形成固定的刻板印象”^[5]。

一、“贴标签”:污名化的起点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由于洪灾、旱灾、饥荒和战乱等原因,大批苏北人(以农民为主)背井离乡,流落到上海寻找生活出路。此时的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被开放为通商口岸后,成为一个新兴

收稿日期:2009-03-20

作者简介:闻羽(1984-),男,江苏盐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心理学。

的工商业都市迅速发展起来。早期移民的来源地“主要有三块地区:广东、江南(浙江的宁波——绍兴地区和江苏的无锡——常州地区)和江苏北部(谓之苏北)”^{[2]10}。由于早期来到上海的苏北人大多是逃难的农民,他们没有多少文化和技术,只能从事码头搬运、拉黄包车、清洁垃圾和粪便等又苦又脏又累的行当。大部分苏北人的居住地集中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住在用竹席、毡布、土块搭建的阴暗潮湿的简易屋棚里。“苏州河畔摇摇欲坠的小房,铁路线旁东倒西歪的棚屋,都是苏北人赖以遮风避雨的栖身之地”^[1]。这些聚集地被也称为棚户区,环境和卫生状况极其恶劣。

由此可见,初到上海的这些苏北人职业单一,居住集中,语言和沪语的差别极大,有着其特有的生活方式,正是这些同质性很强的特征,使得上海本地人和江南人产生了这样的认知和信念:这些人属于一个内聚性的同质族群和社会类别,进而将其贴上“苏北人”或“江北人”这一标签。“恶劣的经济状况、脏乱差的聚居环境,以及相似的语言和生活方式,这些相同的形象掩盖了苏北移民的内部差异,使他们在江南人眼里呈现位一个整体,并成为嘲讽、轻蔑乃至歧视的对象”^[6],这也意味着关于苏北人群体的一种社会刻板印象和偏见正在逐渐形成和稳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上海本地人和江南人则从事于社会声望较高的职位和工作,诸如政府官员、工商业管理人员和工厂中高技术含量的工种。他们居住在市中心的繁华地带,日常设施配套全面,生活环境相对悠闲舒适。再加上本地人和江南人自认为本身所具备的高素质和先进文化,由此而生的优越感更助长了上海人对于苏北人的歧视程度。

事实上,“苏北人”这个社会类别和社会标签在上海和江南以外的地方并不存在,甚至在苏北人自己的家乡也不存在。苏北人并不是在苏北的人,“只有作为生活在上海的移民,他们才第一次被贴以苏北人的标签”^{[2]35}。更为重要的是,自从被贴上标签以后,他们的同质性负面特征就被无限集中和放大。在上海本地人和江南人眼中,“苏北人”或“江北人”的标签从产生之初,就一直与贫穷、无知、愚昧、低劣、落后的负面意义联系在一起,在此情形下,在特定范围内,也开始了对上海苏北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歧视和不公正对待。

二、被污名者:地位的丧失与歧视

在居住格局上,一方面苏北人的居住区始终被严格控制在城市的边缘地带,难以进入中心城区;另一方面,近代上海市政当局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拆除苏北人聚居的棚户区,认为其有碍城市环境,影响公共卫生,“差不多就在棚户区出现的同时,市政官员和房地产投资商就力图把这些刺眼的东西从城市风景线上去除之”^{[2]42}。

在文化方面,与苏北文化相关的一切都会被主流文化所排斥。苏北方言和口音会遭人戏谑,苏北服饰和衣着风格也会被人鄙夷;淮扬菜系纵然名气不小,但是却不被上海主流厨艺界所认可,远不及上海本地菜、广式菜系、宁波菜系那么流行,“往往仅在烹饪指南的最后一部分一带而过”^{[2]50};作为苏北剧的淮剧和扬剧很少能够在上海的正规大剧院里上演,只能在苏北人聚居区的露天舞台上演出,有时候就像“草台班似的,在马路上搭个棚进行演出”^[1]。

在就业格局上,这种隔离和歧视体现得更加明显。“吸收江南人和苏北人的职业是分层级的,苏北人干的是工资低、地位低的话;要求高水平技能或教育的工作,苏北人很少能谋得到”^{[2]57}。没有技术含量、本地人不愿意从事的体力工作,大部分都由苏北等地的人来承担,即使在一些工厂的非技术性岗位的招聘上,雇主也宁可高工资录用本地人和江南人,也不愿雇佣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江北人。“在其他技能不高、常被人歧视的服务行业中,苏北人也同样占优势”^[7],比如理发师和浴室里的擦背修脚工。

日常生活的一些方面也常常体现出对苏北人的歧视、蔑视和仇视,“江北人”或者“江北佬”类似的称谓属于上海方言中比较刻薄的骂人话,“不仅用以指某个名副其实的苏北人,而且也用以斥骂某个地位低下或不讲道理的人”^{[2]98};再比如,说话粗俗或者不讲卫生的人会被讥讽为像“江北乡巴佬”等等。除了言语歧视外,行为欺辱亦时有发生,在同一个工厂里,苏北工人有时会遭到江南工人的拳打脚踢。

即使在1949年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尽管官方强调阶级划分,但污名化的“江北人”标签仍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作为贫穷落后的隐语在运作,它依然波及到求职、日常交往和婚姻等方面。曾几何时,一些上海人择偶的重要标准便是“必须

不是苏北人”。而上海的苏北人自己也会刻意隐瞒其苏北身份,许多人在家外或邻里间都讲普通话,只有回家才讲江北方言。还有一些苏北人在填写籍贯时,不写具体原籍,而只写“江苏”^{[2]99-103}。这样花费很大的力气来掩盖其苏北身份,也从侧面反映了污名化和偏见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流行信念,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依旧有其影响力。

三、污名建构背后:社会心理学解读

1. 现实利益冲突理论(realistic conflict of interests theory)

现实利益冲突理论由 Sherif 提出,该理论认为“群际冲突和歧视产生的原因是各群体对现实资源的争夺”^[8],也就是说对利益的争夺会造成群体间的摩擦和冲突。现实冲突相关理论主要是“从团体或群体出发,认为竞争有限的资源、政治权力与社会地位导致了团体间的冲突,并导致了偏见与歧视的增加”^[9]。

从本源上来讲,江南人和苏北人同属于上海的外来移民,但富庶的江南人先于苏北人立足于上海,而苏北人的大规模迁入势必会冲击既有的经济社会结构,因此二者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与对立关系。《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一书也提到,“苏北人和江南人之间的冲突是19世纪晚期以来上海最突出的两个不同籍贯族群的分隔”^{[2]10}。在江南人与苏北人的竞争中,处于社会上层阶级的江南人集团无疑拥有更强势的手段和话语权,他们通过污名化等方式来合法打压苏北人群体,捍卫自身的利益与地位,维持有益于自己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划分。从污名建构的角度来看,这种污名化的过程为社会排斥寻找合理化依据。江南人作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强势群体,为了排斥苏北人这个“人多但势弱”的群体,所以对该群体的身份、文化、素质进行污名化处理,以证明他们被不公平对待的合法性。

2. 挫折——攻击理论和替罪羊理论(theory of scapegoating)

社会心理学中挫折——攻击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挫折容易导致攻击行为,“通常攻击是针对导致挫折的人或物,但是如果真正的目标不能获得,或直接的攻击会受到惩罚,攻击就会转向一个替代性目标”^[8]。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替罪羊理论认为,“人们在遇到挫折或不愉快时,将倾向于把攻

击转向被厌恶的、可见的、相对弱势的团体”^[9]。

1932年“一·二八”事件后日军进攻上海期间,苏北人史无前例地成为被责难的对象。他们被当作日军滋扰上海时许多犯罪活动的替罪羊,当地一些报纸常出现“江北流氓在闸北抢劫”的新闻,还有诸如“无知和文盲的苏北人被日本人收买做特务工作”^{[2]88}云云。在这个事件中,因为个别苏北人的不良行为,于是人们把矛头指向了长期受到蔑视的整个苏北人群体,再加上新闻媒体带有明显歧视意味的指责,使得所有江北籍贯的人统统成为社会舆论的受害者,被迫承担起“江北汉奸”的污名。事实上,“江北汉奸”是一种大众心理预设的体现,少数苏北人成为汉奸的证据足以激发一种尚在流行的先入为主的偏见。这种预设反映了对苏北人业已存在的污名化,也反映了要把通敌罪归咎于某种人的需要。

3. 社会同一性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社会同一性理论由Tajfel等人提出,他们认为社会分类、群际比较以及人们对积极的社会同一性的追求是群际冲突的根源所在,“当群体形成时,个体对群体的态度随之产生,群体内的自尊行为和群体间的歧视行为也随之存在”^[10]。根据该理论的观点,挫折或者现实利益的冲突并非群际冲突的必要条件,“群体划分本身就能够引发敌意性的群际行为”^[11],也就是说,简单的团体划分便足以造成群体之间的竞争和歧视,这意味着即使在社会常态条件下,群体间的排异心理也会自然产生。

在《苏北人在上海》一书中,作者一再强调“上海苏北人”这个族群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正是江南人和本地人根据自身群体的需要,建构了“苏北人”这个反衬的另类,并对之进行污名化,“这个标签使南方当地人得以把自己和那些北方来的穷邻居区分开来”^{[2]35},江南人是对苏北人进行污名化的主力军和获益者。根据社会同一性理论,“对内群体的偏好和对外群体的歧视使内群体获得积极的区分性,使自己追求积极的自我评价和自尊的需要得到满足”^[8]。江南人正是通过强调苏北人的负面特征将其区分为不同于自己的外团体,而自己和本地人则理所当然地属于作为上海主人身份的内团体。在对苏北人这个外来团体的消极评价和比较中,江南人表现出对外群体的排异心理和积极的“内群体偏爱”心理,不断认同内团体并增强个体

的自尊和优越感。

对近代上海苏北人的污名化是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的一种社会现象,苏北人之所以成为偏见和歧视的对象,是由多重因素共同建构的结果。本文所探讨的社会心理的发生机制只是其中一个部分,要想更全面的理解分析关于近代上海人对苏北人的歧视问题,必须综合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多视角来进行研究和解释。

当然,在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对于上海苏北人的污名化和歧视现象已经变得非常稀罕了,无论是上海苏北人的后代还是之后前

往上海闯荡的苏北人,大多都已不再避讳自己的身份和籍贯,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有许多,人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高,多元化的生活习惯和消费方式成为常态,人们易于接纳各式各样的思想和事件,而且现实生活中有着许多苏北人或者其他外地籍贯的人在政界、商界成功的事例,可见对于上海苏北人的偏见和歧视已经逐渐被历史所湮没,“上海苏北人这一概念也终将成为一个历史概念”^[12]。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新时期里一些新的社会偏见和歧视正在生成,因此,始终保持对社会歧视的反思和警惕,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当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何金海.“苏北人”——上海地方文化的一个问题[J].上海市建设职工大学学报,1999(1):38-39.
- [2] [美]韩起澜(Emily Honig). 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3] 管健. 污名研究: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交互视角分析[J]. 江淮论坛,2007(5):110-115.
- [4] 孙立平. 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的流动[M]//李培林. 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5] 张友庭. 污名化情境及其应对策略——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及其社区变迁的个案研究[J]. 社会,2008(4):126-147.
- [6] 徐民华,李霞. 近二十年苏北研究的域外视角[J]. 江海学刊,2003(4):193-199.
- [7] 马俊亚. 近代江南都市中的苏北人:地缘矛盾与社会分层[J]. 史学月刊,2003(1):95-101.
- [8] 付宗国. 西方社会心理学关于群际行为的研究述评[J]. 心理学探新,2002(3):14-17.
- [9] 李忠,石文典. 国内外民族偏见理论及研究现状[J]. 广西民族研究,2008(1):24-29.
- [10] 安秋玲,王小慧. 社会同一性理论述评[J]. 石家庄学院学报,2007(3):63-67.
- [11] 付宗国. 群际行为的社会同一性理论介评[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5):16-18.
- [12] 邵建. 研究上海苏北人的力作——韩起澜《上海苏北人》评介[J]. 史林,2001(2):104-108.

Discussion on the Stigmatization of People in Shanghai from Social Psychology

WEN Yu

(School of Sociology in Nanjing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stigmatization of Subei people was a social phenomenon which had special historic background and circumstance. The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to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were constructed and influenced by several factors. On the basis of some investigation before,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process of stigmatization from a 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There are also discussions about the cause and mechanism of stigma constructing.

Keywords: social psychology; Shanghai; Subei people; stigmatization

(责任编辑:李 军;校对:洪 林)